



中国私营企业主的社会构成： 阶层与同期群差异^{*}

范晓光 吕 鹏

摘 要：基于中国私营企业调查历年数据，试图回答“私营企业主的社会构成”这一经典命题。经过近40年的发展，私营企业主的总体构成已发生重大变化，有市场背景、受过高等教育、非政治党派的构成在上升。通过将私营企业主的职业流动进一步划分成“下海”、“改制”、“跨界”、“跳板”、“草根”等类型，发现大、中、小三种类型的企业主在创业前的职业流动存在显著差异，尤其是大企业主更有可能来自体制内下海或改制，而中小企业主以体制外成长为主。多元回归和系数集束化分析表明，教育程度与政治身份在阶层地位和同期群方面对企业主职业流动产生不同的影响。

关键词：私营企业主 职业流动 阶层 同期群

作者范晓光，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浙江大学地方政府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杭州 310058）；吕鹏，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副研究员（北京 100732）。

一、问题的提出：私营企业主的社会来源差异

私营企业主群体的社会构成是认识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一个重要切入点，而我们的诸多观念仍停留在20年前相关研究的经验层面。近年来，随着私营企业群体进入代际更替期，第一代即创业代退居“二线”，新生代走到“前台”，“接

*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主持的“中国私营企业调查”。中国社会科学院私营企业群体研究中心负责日常管理的“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发布平台为该调查数据正式授权发布渠道。感谢上述机构提供数据协助。初稿先后在“政商关系研究”工作坊（2015，广州）、“转型社会的人口、家庭与分层”工作坊（2016，金华）和“社会分层与流动”夏季论坛（2016，兰州）上宣读，感谢刘欣、曹洋、吴愈晓、陈宗仕、林宗弘、罗忠勇、朱斌等师友及匿名评审人的批评建议，文责自负。



班”的问题日益凸显，这种内生动力正在改变民营企业家的社会构成；同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理念成为培育和催生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力，营商环境有了新的改善。

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最新数据，截至 2016 年底，全国私营企业数量实有 2309.19 万户，比 2014 年底（1546.37 万户）增长了 49.3%，比 1995 年底（65.5 万户）增长了 34 倍。越来越多的新鲜血液加入到了民营企业家的队伍当中。2016 年底全国私营企业投资者人数为 4200 万人，比 2014 年底（2963.1 万人）增长了 41.7%，比 1995 年底（134 万人）增长了 30 倍。

遗憾的是，关于“民营企业家的社会构成”这一议题的学术研究在经历了 20 世纪 90 年代和 21 世纪早期的一段“高潮”之后，现今陷入沉寂。有研究者不再满足于对企业家职业流动的研究，^① 亦有学者认为这一议题可能不再有什么“新鲜”的发现。^② 然而，在我们看来，这一议题的理论意义常青。阶层与社会形成（social formation）成为社会学元理论的经典议题；^③ 市场行为主体的构成到底是什么，他们异质化或同类化的程度到底有多高，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经验问题，而且直接关系到对整个社会结构性质的理论判断。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探究静态的阶层分化。民营企业家这一群体内部在经济位置（财富）、政治身份（权力）和社会评价（声望）乃至主观地位认同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④ “民营企业家”这一极具中国特色的概念，指的是一种群体（group）或身份（status）；同样是民营企业家，他们的“组内差异”，可能并不比他们与其他一些群体之间的“组间差异”小。如果说一些大企业家已经是“精英阶层”的一员，那么，许多中小民营企业家更贴切说算是“中间阶层”、“小工商阶层”的一分子。于是，引发我们兴趣的第二个研究问题是：中国的大企业家、中企业家和小企业家，从其社会来源（social origin）上看，究竟是一种来源，还是多种来源？或者说，从出身构成上看，他们是一类人，还是三类人？

将阶层分化与同期群差异相结合，构成本文的第三个问题：不同时期创业的大企业家、中企业家和小企业家，在社会来源上存在怎样的差异？即我们今天看到的大中小企业家的内部构成与几十年前相比，有怎样的不同？如果有，是否可以从中

① 李路路、朱斌：《中国经济改革与民营企业竞争格局的演变》，《社会发展研究》2014 年第 1 期。

② V. Nee, “China in Transition,” *Accounts*, no. 7, 2008, pp. 3-8.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461—579 页。

④ 李路路：《转型社会中的民营企业家——社会来源及企业发展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年；范晓光：《中国民营企业家的职业流动与阶层地位认同（2004—2014）》，王钦敏主编：《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 No. 12（2014—2015）》，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6 年，第 99—119 页。

归纳出一定的趋势,进而预测未来中国私营企业主群体的构成变化?

二、文献回溯

在我们看来,企业主创业前的职业流动经历(mobility trajectory),不仅反映了中国宏观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变迁,也在微观勾勒了个体作为能动主体的行动策略。调查数据显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许多私营企业主们在创建企业之前有过丰富的职业流动:1997—2004年间,从未有过职业流动的私营企业主比例高于10%,而2006—2014年间在10%以下波动;有过1次流动经历的占比以2004年为分水岭,之后5次中国私营企业主调查的结果都超过50%;而流动3次及以上的比例也有类似特征。^①

私营企业主社会流动频繁,其来源也较为复杂。研究发现早期来自社会底层或边缘化的社会群体可能占较大比例,^②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私营企业主的来源呈现多元化,既有因为自己能力无法完全施展而“下海”的国有部门职员,也有寻求稳定工作的城乡无业人员,还有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无论经济收入、社会声望都较高的党政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③在这一背景下,学术界在“国有背景的人是‘下海创业’主体”这一问题上发生激烈争辩。有人认为干部进入私营经济(主要是成为乡镇企业家和个体户)的几率在下降,^④但更多的人认为拥有干部经历的人更有可能成为企业家,来自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干部的人已成为主流。^⑤即拥有“体制资本”的私营企业主在发展中更有优势。^⑥有学者认为,在2000年以后,这

① 范晓光:《中国私营企业主的职业流动与阶层地位认同(2004—2014)》,王钦敏主编:《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 No. 12(2014—2015)》,第99—119页。

② C. Hsu, “Cadres, Getihu, and Good Businesspeople: Making Sense of Entrepreneurs in Early Post-socialist China,” *Urban Anthropology and Studies of Cultural Systems and World Economic Development*, vol. 35, no. 1, 2006, pp. 1-38.

③ 戴建中:《中国私营经济的社会状况与“市场过渡”》,《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4期。

④ V. Nee, “Social Inequalities in Reforming State Socialism: Between Redistribution and Markets i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56, no. 3, 1991, pp. 267-282; X., Wu, “Communist Cadres and Market Opportunities: Entry into Self-employment in China, 1978-1996,” *Social Forces*, vol. 85, no. 1, 2006, pp. 389-411.

⑤ Á. Róna-Tas, “The First Shall Be Last? Entrepreneurship and Communist Cadres in the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m,”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0, no. 1, 1994, pp. 40-69; 宋时歌:《权力转换的延迟效应——对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转变过程中的精英再生与循环的一种解释》,《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3期; 陈光金:《从精英循环到精英复制——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形成的主体机制的演变》,《学习与探索》2005年第1期。

⑥ 李路路:《社会结构变迁中的私营企业家——论“体制资本”与私营企业的发展》,《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2期。

种格局发生了进一步强化，私营企业主群体的成长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中国各种精英、准精英再生产的过程。^① 此外，还有人认为拥有高等学历的人会越来越多地加入私营企业家的队伍；^② 在对 1992 年之前与之后创业的“超级富豪”对比时，两个组群之间的教育差距尤为突出。^③

不过，亦有学者指出，私营企业主的构成并不能简单概括为精英再生产，而是精英循环和精英再生产并存；^④ 相比市场型企业家，来自体制内的、具有党员身份的企业主固然在经济改革初期具有相对竞争优势，但这一优势随着改革的推进而减弱，主要是经济扩张使得市场型企业家抓住市场机遇，获得更大收益；^⑤ 即便今天许多创业成功的大企业家，一般也出身于普通家庭或起步于工薪职业。^⑥ 这对回答“谁成为企业家”以及“谁成为大企业家”这样的问题增加了难度。

时代发展为我们重访这一议题提供了经验可能。在学理上，既有研究存在进一步挖掘的空间。首先，不少相关研究将企业家作为同质群体（企业家研究传统），或简单划分为“自雇者”与“企业主”两个类别（社会分层研究），较少研究从阶层划分的角度将不同阶层位置的私营企业主放在同一分析框架中考察。其次，现有研究多基于横截面数据对职业流动轨迹作描述统计，跨时期比较和多元统计分析相对不多，从而未能很好地揭示不同时期的动态变化趋势。最后，在为数不多的职业流动文献中，对流动轨迹的形成机制缺乏深入分析。

本文试图在以上三个方面有所突破。数据分析主要涉及三类问题：不同阶层位置的私营企业主的社会来源差异、私营企业主职业流动经历的时代差异、同期群差异。通过 1997—2014 年间共计 7 次全国私营企业调查资料，对企业主职业流动进行描述统计。通过多元回归分析，揭示教育和党员身份对不同阶层位置的私营企业主职业流动的影响，以及对同期群的作用差异。

① B. Dickson, *Red Capitalists in China: The Party, Private Entrepreneurs, and Prospects for Political Chan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② 陈光金：《从精英循环到精英复制——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形成的主体机制的演变》，《学习与探索》2005 年第 1 期。

③ 吕鹏：《新古典社会学中的“阿尔吉之谜”：中国第一代最富有私营企业家的社会起源》，《学海》2013 年第 3 期。

④ 李路路：《私营企业主的个人背景与企业“成功”》，《中国社会科学》1997 年第 2 期。

⑤ 李路路、朱斌：《中国经济改革与民营企业竞争格局的演变》，《社会发展研究》2014 年第 1 期。

⑥ 吕鹏：《新古典社会学中的“阿尔吉之谜”：中国第一代最富有私营企业家的社会起源》，《学海》2013 年第 3 期。



三、研究设计

(一) 数据

本研究使用第 3—11 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1997—2014）对私营企业主在创业前的职业流动进行分析。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每两年进行一次。早期的正式名称和主持机构一直在变化。1993 年第一次调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与全国工商联研究室共同主持。1995 年第二次调查改由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全国工商联共同主持。1997 年的调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张厚义研究员筹集经费以“中国私营企业课题组”的名义进行。主持 2000—2002 年两次调查的单位则变更为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和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从 2004 年起，历年调查由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四家单位主持，调查的正式名称固定为“中国私营企业调查”。该调查在实际执行层面依托各省（区、市）工商联和工商局力量，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中国社会科学院私营企业主群体研究中心负责该数据的日常管理。

数据清理后，本文得到一个样本量为 19189 的数据集，其中 1997 年、2000 年、2002 年、2008 年、2010 年、2012 年、2014 年的子样本数分别为 1419、2234、2195、2674、3256、3489、3922。^①

(二) 操作化与测量

私营企业主在创立企业前的职业流动经历是本研究的因变量。针对 7 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相关题器的设计，^② 首先，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集体企业视作体制内部门，外资、港澳台企业和其他私营企业作为体制外部门。其次，根据转型期再分配与市场的区隔特征，将职业流动划分为以下五类“理想型”：1. “下海”型；2. “改制”型；3. “跳板”型；4. “跨界”型；5. “草根”型。其中，“下海”型是指在创立企业前仅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工作过的企业主；“改制”型主要是在国有集体企业工作过的企业主，也包括一部分从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流动至国有集体企业，并最后创业的企业主；^③ “跳板”型是在“三资”/外资企业或其他私营企业工作过

① 由于 2004 年、2006 年和 2016 年调查中的职业流动测量与本研究设计有一定差异，故未作分析。

② 1997—2002 年和 2008—2014 年调查的职业流动题器设计略有不同，我们对其作了统一化处理。

③ 在理论上，还存在从国有、集体企业流动至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并“下海”创业的企业主。然而，这种从企业到机关的职业流动更多属于“被提拔”，之后创业的可能性较小，在数据资料中的比例极低。



的企业主；“跨界”型是既经历体制内部门，也经历过体制外部门的企业主；“草根”包括只经历过村干部、① 个体户、下岗失业、外出打工、海外留学等形式的职业流动——这一类别的情况比较复杂，草根这一“标签”大体上是说他们作为“自下而上的市场力量”。②

本文根据企业规模划分出三种阶层位置的私营企业主：大企业主、中企业主和小企业主。我们从企业主所在的私营企业的企业层面（firm-level），选取与企业主资产规模关系最为密切的替代性指标来进行测量。③ 具体而言，首先将企业主划分为大企业主与中小企业主。划分的依据是《全国工商联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分析报告》（2000—2014）对规模以上企业的划分标准：2000年以前的门槛是当年营业额为1.2亿元，2004—2011年间为3亿元，2012年以后上升至5亿元。本研究将规模以上私营企业的所有者界定为大企业主，由此得到大企业主和中小企业主两大群体。然后，在中小企业中，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标准，将工业营业额不超过3000万和其他行业不超过1000万的企业拥有者界定为小企业主，其余为中企业主。

为更好地比较私营企业主的群际差异，本文根据创立企业时点的不同构建了“创业同期群”，具体划分为“1978—1995”、“1996—2005”和“2006—2014”三大类。其中，虽然个体私营经济事实上在1978年之前就在多地以各种地下经济的形式出现，④ 但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告了全面改革开放开始，其被广泛作为“市场转型”的起始年。1995年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提出对国有企业实行“抓大放小”的改革战略。此后，各地采取改组、联合、兼并、股份合作制、租赁、承包经营和出售等多种形式，把一大批小企业直接推向市场。这种大规模的国有企业改制引发一些学者对改制和“资产流失”的担忧，⑤ 大量干部和国有企业经理人

① 对于只有过村干部经历的人，本文既没有把其纳入“下海”类型，也没有把其纳入集体企业“改制”类型中。虽然村干部属于基层政权的一员，但他们投身私营经济的故事多与国家干部有着很大不同；如果一名村干部同时有在（农村）集体企业的职业经历，那本文会将其归入“改制”一类，否则单独算做一类。

② 参见 V. Nee and S. Oppen, *Capitalism from Below: Markets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③ 调查中实际询问了企业主的“年薪”，但企业主的“年薪”情况非常复杂（很多企业主认为自己不拿“年薪”），并不适合测量企业主的资产规模；调查还询问了企业主全家总收入，这一指标与企业主本人的资产规模也相去甚远。

④ 刘雪明、吴俐磊：《1957—1966年党的个体私营经济政策述评》，《党史研究与教学》2001年第2期；朱小斌、杨缅昆：《中国地下经济实证研究：1979—1997》，《统计研究》2000年第4期。

⑤ L. Chun, “Against Privatization in China: A Historical and Empirical Argument,”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vol. 13, no. 1, 2008, pp. 1-27.

开始“下海”。^① 2005 年落幕的“郎顾之争”表明私营企业的非规范化引发舆论热议，导致一系列制度后果（比如叫停大型国有企业的管理层收购）。我们选择上述三个年份作为划分时期的起始年份，旨在揭示不同创业同期群中私营企业主的构成差异。数据分析（图 1）证明了该划分的合理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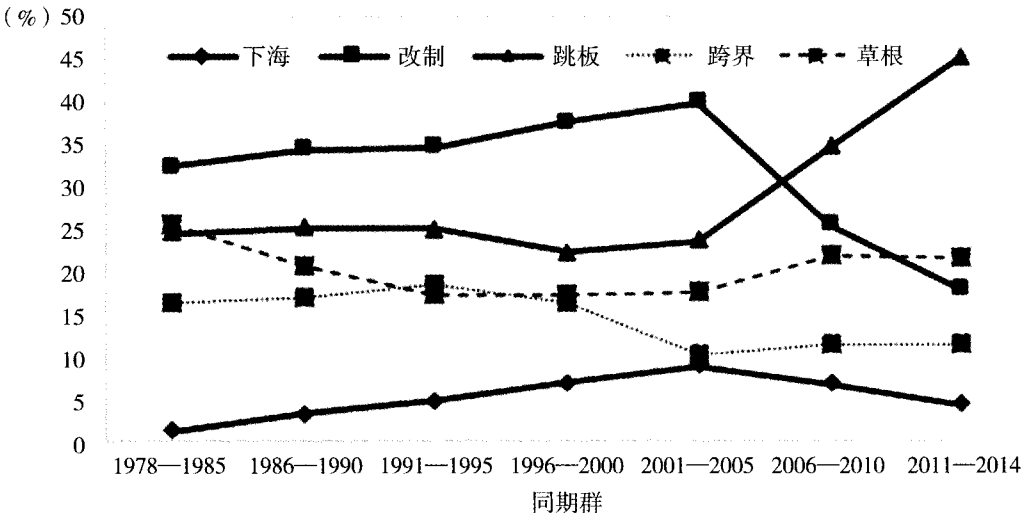


图 1 职业流动在同期群的变化趋势

除以上核心变量，还包括以下变量：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党员身份、地区和行业。其中，地区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行业分为实体和非实体，非实体经济指主营业务仅限于金融保险和房地产的企业。表 1 为以上变量的描述统计。

表 1 变量的描述统计

	小企业主	中企业主	大企业主
职业流动 (%)			
下海	5.77	8.21	9.21
改制	32.79	38.59	40.07
跨界	27.42	23.36	23.09
跳板	14.26	14.14	14.21
草根	19.76	15.70	13.43
创业同期群 (%)			
1978—1995 年	27.35	23.46	28.52

① 参见章敬平：《权变：从官员下海到商人从政》，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 年；周庆行、吴新中：《放大与透视：新一轮“官员下海”解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4 年第 2 期。

续表 1

	小企业主	中企业主	大企业主
1996—2005 年	50.07	61.41	61.82
2006—2014 年	22.58	15.13	9.66
教育程度 (%)			
初中以下	19.47	13.80	11.10
高中	34.24	24.28	17.31
大专	30.76	36.51	32.19
本科以上	15.54	25.40	39.40
政治面貌 (%)			
中共党员	28.31	38.62	50.28
民主党派	4.95	7.74	8.77
群众	66.74	53.64	40.95
实体经济 (%)	4.20	7.77	7.33
男性 (%)	85.14	88.05	94.23
地区 (%)			
东部	52.23	60.29	62.49
中部	24.71	19.00	18.98
西部	23.06	20.71	18.53
年龄*	44.73	46.27	48.26
	(8.62)	(7.85)	(7.73)
N	13536	4752	901

注：*为均值，括号内为标准差。

(三) 统计分析策略

考虑到职业流动是多类别变量，本研究采用多元逻辑斯蒂回归 (Multi-nominal logit) 模型。在跨样本回归模型的系数比较中，不仅比较显著度水平，还运用系数集束化 (sheaf coefficients) 方法比较核心自变量对因变量的效应。^①

① D. R. Heise, "Employing Nominal Variables, Induced Variables, and Block Variables in Path Analysis," *Sociological Methods and Research*, vol.1, no.2, 1972, pp.147-173.

四、分析结果

(一) 私营企业主群体职业流动的基本特征

1. 职业流动经历的历时趋势

图 1 揭示了五种职业流动经历的私营企业主在 1978—2014 年间各创业年份的分布状况。^① 从历年创业的人群分布看,“下海”企业家的比例总体来说是最低的,基本都在 10% 以下;从 1996—2005 年间,“下海”企业家比例有一段较为稳定的小幅增长期,此后则开始一路下滑。这种变化趋势反映了 20 世纪 90 年代到 21 世纪初“下海创业潮”的兴起及衰落。

既在体制内也在体制外工作过的“跨界”流动(大多数可能是从体制内流动到体制外)某种程度上与“下海”的变迁类似。这一类型的比例在 1978—1990 年间有一个小幅的上升,但随后大体延续了自 1981 年以来在 20% 左右小幅变动的趋势;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 1995 年,随后开始下降。在 2000—2014 年间,基本保持在 10%—15% 的比例。该比例下降的原因,除时代变迁外,还有可能来自其他职业流动轨迹的快速上升。

“改制”经历的企业主比例变化曲线更为明显地反映了时代变迁。我们发现,首先,一直到 2005 年前,虽然少数年份偶有波动(1985—1986 年和 1998—1999 年),“改制”^② 是中国私营企业主的一个主要来源,即曾在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工作过的人是私营企业主的主要来源——这些人不一定是企业的管理层。其次,从 2005 年开始,“改制”的比例有了明显下降。部分可能是因为职业流动结构变迁的影响,也不排除 2005 年后整个国有企业改制大环境变化的影响。

在其他私营经济部门工作过的(“跳板”经历)企业主的比例在 2005 年前一直是私营企业主的第二大来源,他们代表了从未在体制内工作过的群体。自 2000 年以后,这类比例有一个明显且持续的增长,到 2005 年后,超过“改制”型,几乎占据半壁江山,成为私营企业主的主要来源。

在 2006 年后迎来持续性稳定增长的,还有“草根”型企业家。“草根”型的比例在整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刚开始的波动较大,时高时低,在 1991—2005 年间一直在 17%—18% 间徘徊,此后开始一直占到 20% 以上。来自国有和集体企业的企业家比例的下降,和来自市场的企业家比例的上升,恰恰是中国市场经济转型

① 为更清晰呈现总体变化趋势,将 1978—2014 年间创业的人平均划分为 7 个同期群,与后文机制分析中的同期群操作化方式略有不同。

② 当然,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走向私营经济的情况错综复杂,这些企业也有可能是破产、兼并、联合等类型,本文用“改制”这个概念不等同于“管理层收购”。

的真实写照。^①

2. 教育与职业流动

图2显示，在历年创业的私营企业主中，本科及以上学历持有者的比例在不断提高：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创业的企业主中，这一比例还仅为个位数；到了90年代末21世纪初，已达到20%左右；最近5年都在30%以上。大专学历持有者的比例大体上也在稳步增长。可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私营企业主的教育面貌已焕然一新。

值得注意的是，初中以下学历的比例持续下降，高中学历的比例相对稳定：从90年代中期开始至今，都在30%—35%之间波动。分析表明，他们中又以小企业主为主。中国的私营企业主当中仍然有近1/3的人属于高中学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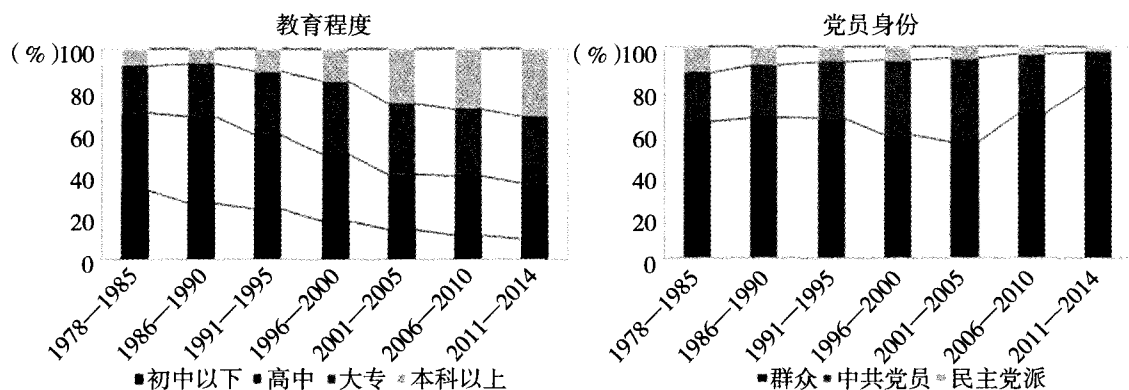


图2 政治面貌、党员身份在同期群的变化趋势

不同阶层位置的私营企业主在教育水平上的差距如何？从表1可以看到，大、中、小企业主接受过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比例有显著差距，分别为39.40%、25.40%和15.54%，如果再加上大专学历，则分别为71.59%、61.91%和46.30%。总体而言，大企业主所受的教育水平更高。^②

有关各阶层位置的企业主在职业流动轨迹上的教育差异，在“下海”企业主中，无论企业规模大小，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都是最高的，且差距并不明显。我们并未统计样本的职级信息，但通过同行的研究可知，^③ 受过高等教育且在党政部门工作过的人绝大多数都具有干部身份。换言之，在“下海”企业主中，国家干部是“主

① 本文并不是说“改制”型的企业家就一定代表了由体制内向体制外的转变。大量的集体企业实际上是由个人发起或承包的，尤其以戴“红帽子”的“乡镇企业”最为典型。这一类企业虽名为集体企业，实际上是“私营”企业的雏形。受数据本身限制，本研究暂无法对该类企业作进一步甄别。

② 受数据限制，无法甄别出被访者的学历究竟是在创业前获得，还是创业后获得。

③ 孙明：《家庭背景与干部地位获得（1950—2003）》，《社会》2011年第5期；余洋：《从精英国家化到国家精英化：我国干部录用制度的历史考察》，《社会》2010年第6期。

力军”。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改制”企业主中，只有大企业主中本科文凭拥有者占有优势（41.00%），他们很可能曾经是企业管理层；小企业主中高中文凭（32.55%）比例最高，他们很可能在创业前只是“改制”企业的普通技术人员甚至体力工人，小企业主中拥有本科学历的占 15%。“跳板”、“跨界”、“草根”类企业家的情况与“改制”类似：大企业主中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明显高于中小企业主。

进一步的比较表明，对于绝大多数的职业流动轨迹，随着创业时间的推迟，拥有大学学历的比例都有明显提高。这表明私营企业主群体整体教育水平不断提升。唯一例外的是“草根”这一类别，各同期群中各学历类型的比例虽有波动，但差别并不明显，数十年来始终保持着以高中和大专为主的格局。这说明，以个体户、下岗职工为主的“草根”型创业者依然以中低教育水平为主。

3. 党员身份与职业流动

不同年份创业的企业家政治面貌变化趋势值得探讨（见图 2）。中共党员的比例在 1995 年前徘徊在 25% 左右，自 1995 年突破 30% 后，一直保持增长态势，到 2005 年增加到 40% 左右。此后开始下降，2011—2014 年间创业的企业家中，中共党员比例跌至 16.29%。2014 年的数据显示这一比例开始上升，后续趋势需要进一步观察。

民主党派的比例在 1990 年前虽存在波动，但大多数年份占比较高，都在 10% 以上。从 1990 年开始，这一比例下降幅度较大。通过计算可知，这不完全是由中共党员比例上升造成的。从 2005 年开始，创业者中中共党员和民主党派的比例之和就开始下降。也就是说，晚近的创业者中越来越多的人没有加入任何党派。这也许与加入私营经济的企业家的队伍逐年增长的速度快于中共党员和民主党派吸纳的速度有关。

描述统计还显示，无论是哪一种职业流动轨迹，企业主拥有中共党员身份的可能性随着企业规模递增，大企业主更有可能是党员。其次，党员身份的可能性与是否在体制内工作正相关，最高的是“下海”企业主，而后是“改制”和“跨界”类，这三类都或多或少有体制内工作经历；“跳板”类企业主中党员比例最低，甚至低于“草根”类，这可能与他们只从事过体制外工作有关，而“草根”类型中包含了村干部这样的基层创业者。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并不是所有调查年份都询问了入党年份这一关键信息，我们只能根据部分截面数据了解到，这些体制外成长的企业家入党大多是在创业之后，而拥有体制内经历的企业主有相当比例是在创业前入党。^①

结果还显示，无论哪种职业流动轨迹，1996—2005 年间的创业者中党员比例都大幅高于前一时间段（1978—1995）。我们推测这可能与 2001 年“七一讲话”前后

① 陈光金：《中国私营企业主的形成机制、地位认同和政治参与》，《黑龙江社会科学》2011 年第 1 期；张厚义、吕鹏：《私营企业主的经济分化与政治面貌变化》，陆学艺等主编：《2013 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年，第 322—332 页。

开始允许私营企业主入党有关，此后，吸收私营企业主入党迎来了一个制度上的鼓励期。但各组党员比例在 2006—2014 年间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二）私营企业主职业流动的形成机制

表 2 呈现了阶层地位对私营企业主职业流动的影响。^① 其中，模型 1、2、3 分别是对企业主子样本的分析。总样本分析显示，^② 相对于初中及以下学历者，高中或大专文化程度者经历“下海”和“跳板”流动的几率都低于“改制”，但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下海”流动几率反而更高；中共党员“下海”流动的几率高于“改制”流动，而“改制”又高于“跳板”。值得注意的是，与小企业主相比，中型企业主拥有“跳板”流动经历的几率是“改制”的 84.95%，不过大小企业主之间没有显著差异；同时，“下海”和“跨界”流动在不同企业主中的几率缺乏显著差异。这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后，不同企业家的职业流动仍然存在内在异质性，这提醒我们有必要对子样本的形成机制进行分析。

子样本回归分析结果如下：首先，在小企业主（模型 1）中，本科及以上学历者更可能属于“下海”型（ $p < 0.05$ ），其他类型企业主（模型 2、3）并未显现出相似的特征（ $p > 0.1$ ）；在大企业主中，教育程度效应不显著。在政治身份效应上，小企业主的党员身份对其“下海”的影响效应显著，而其他子样本中未能通过统计检验。其次，相对小学以下学历的小企业主，本科以上者经历“跳板”流动的几率要显著偏低，而在大企业主中却不显著；拥有中共党员身份会弱化小企业主经历“跳板”的几率，而这种弱化效应在大企业中更强，民主党派身份的效应相似。再次，大专或本科以上学历在小企业主中对“跨界”流动有显著的正效应，而在大中企业主中并不明显（ $p > 0.1$ ）。最后，教育程度对“草根”流动的正效应在中小企业主中显著存在，在大企业主中却没有类似的发现。

表 2 职业流动影响因素的阶层比较

模型 1	下海 vs 改制	跳板 vs 改制	跨界 vs 改制	草根 vs 改制
高中	-0.462***	-0.311***	-0.046	-0.467***
	(0.128)	(0.070)	(0.085)	(0.069)
大专	-0.229 ⁺	-0.256***	0.242**	-0.818***
	(0.123)	(0.072)	(0.088)	(0.074)
本科以上	0.337*	-0.287**	0.465***	-1.282***
	(0.132)	(0.088)	(0.111)	(0.099)

① 本文还将职业流动轨迹的缺失值和未经历流动者样本作为一类，纳入分析模型，结果与表 2 和表 3 基本一致。

② 受篇幅所限，文中没有报告相关结果，读者可向作者索取，email: xgfan@zju.edu.cn.

续表 2

模型 1	下海 vs 改制	跳板 vs 改制	跨界 vs 改制	草根 vs 改制
中共党员	0.616***	-0.458***	0.094	-0.459***
	(0.084)	(0.056)	(0.063)	(0.059)
民主党派	0.365*	-0.136	-0.126	-0.460***
	(0.167)	(0.107)	(0.130)	(0.129)
Log Likelihood	-18361	-18361	-18361	-18361
N	13536	13536	13536	13536
模型 2	下海 vs 改制	跳板 vs 改制	跨界 vs 改制	草根 vs 改制
高中	-0.576**	-0.006	0.014	-0.204
	(0.199)	(0.145)	(0.175)	(0.144)
大专	-0.689***	-0.294*	-0.089	-0.896***
	(0.189)	(0.140)	(0.167)	(0.144)
本科以上	0.109	-0.263 ⁺	0.188	-1.452***
	(0.194)	(0.156)	(0.185)	(0.175)
中共党员	0.097	-0.531***	-0.139	-0.654***
	(0.121)	(0.088)	(0.101)	(0.100)
民主党派	-0.375	-0.352*	0.145	-0.592**
	(0.235)	(0.153)	(0.166)	(0.191)
Log Likelihood	-6514	-6514	-6514	-6514
N	4752	4752	4752	4752
模型 3	下海 vs 改制	跳板 vs 改制	跨界 vs 改制	草根 vs 改制
高中	-0.608	-0.330	0.220	-0.076
	(0.523)	(0.384)	(0.479)	(0.417)
大专	-0.278	0.095	0.492	0.123
	(0.521)	(0.374)	(0.468)	(0.421)
本科以上	-0.267	-0.482	0.251	-0.259
	(0.526)	(0.394)	(0.493)	(0.443)
中共党员	0.301	-1.041***	-0.221	-0.609**
	(0.296)	(0.207)	(0.240)	(0.236)
民主党派	0.091	-0.643 ⁺	-0.275	-0.476
	(0.487)	(0.335)	(0.403)	(0.404)
Log Likelihood	-1207	-1207	-1207	-1207
N	901	901	901	901

注:***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 $p < 0.1$; 以上模型控制了性别、年龄、年龄平方、地区、行业、调查年和创业同期群变量。

表 3 中报告了创业同期群对民营企业主职业流动的整体影响。其中，模型 4、5 和 6 分别是对 1978—1995 年、1996—2005 年、2006—2014 年间三大同期群子样本的分析。总体而言，教育程度越高的民营企业主，越可能经历“下海”或“改制”流动。与之相似，中共党员身份在国有部门流动中也呈现正效应。相比于 1978—1995 年间创业的企业主，1996—2005 年和 2006—2014 年间同期群在“下海”和“改制”上没有呈现出显著差异；然而，1996—2005 年间创业者更可能属于“改制”型，2006—2014 年间创业的则更可能属于“跳板”型。

具体而言，首先，相比于“改制”，教育程度高低没有对 1978—1995 年间创业者的“下海”经历带来实质影响（模型 4），但高中或大专学历在 1996—2005 年间创业同期群中具有显著负效应（模型 5），本科及以上在 2006—2014 年间显示出“下海”优势（模型 6）。其次，教育程度对“跳板”流动的抑制作用在所有同期群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弱化，但它对“草根”流动的抑制效应始终稳定。再次，党员身份在 1978—1995 年间创业者中对“下海”型流动没有产生显著影响（ $p>0.1$ ），但在后两个同期群中存在显著正效应；党员身份对“跳板”和“草根”型流动表现出稳健的抑制作用。最后，民主党派身份对 1996—2005 年间创业同期群的“跳板”或“草根”流动具有负效应，这在 2006—2014 年间的同期群中也有相似表现。

表 3 职业流动影响因素的同期群比较

模型 4	下海 vs 改制	跳板 vs 改制	跨界 vs 改制	草根 vs 改制
高中	-0.163	-0.378***	0.010	-0.382***
	(0.234)	(0.106)	(0.117)	(0.107)
大专	0.015	-0.300**	0.234 ⁺	-0.656***
	(0.229)	(0.115)	(0.128)	(0.120)
本科以上	0.326	-0.495**	0.084	-0.822***
	(0.259)	(0.167)	(0.201)	(0.175)
中共党员	0.178	-0.308**	0.079	-0.179 ⁺
	(0.164)	(0.096)	(0.101)	(0.099)
民主党派	-0.149	0.014	-0.217	-0.213
	(0.277)	(0.147)	(0.173)	(0.166)
Log Likelihood	-6753	-6753	-6753	-6753
N	5074	5074	5074	5074
模型 5	下海 vs 改制	跳板 vs 改制	跨界 vs 改制	草根 vs 改制
高中	-0.664***	-0.181*	-0.009	-0.286***
	(0.129)	(0.0869)	(0.108)	(0.086)
大专	-0.569***	-0.238**	0.152	-0.646***
	(0.121)	(0.085)	(0.106)	(0.087)

续表 3

模型 5	下海 vs 改制	跳板 vs 改制	跨界 vs 改制	草根 vs 改制
本科以上	0.128	-0.297**	0.413***	-1.079***
	(0.128)	(0.10)	(0.124)	(0.111)
中共党员	0.460***	-0.488***	-0.044	-0.568***
	(0.085)	(0.061)	(0.071)	(0.066)
民主党派	0.123	-0.227 ⁺	0.204	-0.648***
	(0.166)	(0.116)	(0.133)	(0.148)
Log Likelihood	-14071	-14071	-14071	-14071
N	10253	10253	10253	10253
模型 6	下海 vs 改制	跳板 vs 改制	跨界 vs 改制	草根 vs 改制
高中	-0.029	-0.178	0.060	-0.786***
	(0.324)	(0.178)	(0.267)	(0.165)
大专	0.279	-0.190	0.264	-1.388***
	(0.307)	(0.175)	(0.260)	(0.169)
本科以上	0.796*	-0.241	0.435	-2.058***
	(0.311)	(0.182)	(0.265)	(0.191)
中共党员	0.516**	-0.675***	0.169	-0.642***
	(0.157)	(0.107)	(0.129)	(0.121)
民主党派	0.308	-0.485*	-0.089	-0.695*
	(0.349)	(0.235)	(0.299)	(0.304)
Log Likelihood	-5156	-5156	-5156	-5156
N	3862	3862	3862	3862

注:***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 $p < 0.1$; 所有模型都控制了性别、年龄、年龄平方、地区、行业、调查年和阶层变量。

为进一步比较教育程度和政治面貌对私营企业主职业流动轨迹的效应差异,引入集束化方法进行估计。如表 4 所示,在“下海”与“改制”的比较中,教育程度对中型企业主中“下海”经历的效应明显高于政治面貌的效应(0.353 vs 0.120);在 1978—1995 年间创业的企业主中,教育对“下海”抑或“改制”的效应差异较大(0.133/0.084=1.58),但在 1996—2005 年和 2006—2014 年间同期群的效应差异却略有减小(1.52、1.45)。在“跳板”流动中,政治面貌和教育程度的效应随着企业主阶层地位的提高而增加,只有教育程度效应随着创业时期的推移有所增强;在“跨界”流动中,教育程度效应随着创业时期的推后逐步强化,政治面貌效应相对较弱;在“草根”流动中,政治面貌在大企业主中效应强于教育程度,而从创业同期群看,教育程度效应的相对优势在 1996—2014 年间同期群中有所扩大。

表 4 影响职业流动的效应值比较

	下海 vs 改制	跳板 vs 改制	跨界 vs 改制	草根 vs 改制	下海 vs 改制	跳板 vs 改制	跨界 vs 改制	草根 vs 改制
	小企业主				1978—1995			
教育程度	0.275***	0.115***	0.187***	0.403***	0.133*	0.168***	0.102*	0.273***
政治面貌	0.277***	0.204***	0.053*	0.216***	0.084	0.137***	0.071	0.090*
	中企业主				1996—2005			
教育程度	0.353***	0.135**	0.108*	0.532***	0.332***	0.093**	0.157***	0.357***
政治面貌	0.120*	0.254***	0.085 ⁺	0.321***	0.219***	0.231***	0.053*	0.288***
	大企业主				2006—2014			
教育程度	0.165	0.258*	0.155	0.163	0.330***	0.070	0.159**	0.657***
政治面貌	0.145	0.495***	0.114	0.292*	0.228***	0.295***	0.08	0.293***

注：***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 $p < 0.1$ ；因篇幅原因，未报告标准误。

五、总结与讨论

通过分析 1997—2014 年全国抽样调查资料，我们对民营企业家的构成来源有一个整体的判断：近 40 年来，有过体制内经历的创业者比例在经历一段增长期后开始下降，只有体制外经历的创业者比例大幅上升；虽然高中教育程度始终保持在三成左右，但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逐年提升；中共党员的比例则经历了一个从高峰到平缓的下降过程。与此同时，市场背景人士、高学历人士、非党派人士越来越多地加入到民营企业家的队伍中。与 90 年代中期的研究发现不尽相同的是，民营企业家群体的“体制内色彩”在经历了增长之后开始缓慢下降。

与传统研究路径不同，本文尤为强调三种阶层位置民营企业家的差别，通过对历时性数据的分析揭示民营企业家在社会来源构成上的差异是否随时间推移呈现出各自趋势。分析表明，“谁能成为大企业主”与“谁能成为企业家”的答案有所不同。大企业主中不仅党员比例高于其他两类企业家，受教育水平也明显更高，即体制资本在大企业主中的优势并没有消退。

与早期创业不同，受过高等教育的创业者越来越多地直接进入市场领域，而不是先进入体制内（政府或国企），而后再下海创业。除“草根”类型外，各类企业家中大学文凭持有者的比例在逐年提高。这说明虽然“草根”类型的企业家中低学历人士的比例依然较高，企业家群体的整体学历水平在上升。拥有体制内经历的企业主相较于没有体制内经历的企业主，在教育水平和党员身份上更具优势，且这一优势并没有随时间推移迅速消失。流动轨迹的机制分析表明，相对于“改制”经历，教育程度对中小企业家经历“下海”的效应等同/高于政治面貌，而其对大企业主的

效应差异不显著；政治面貌对“草根”流动的效应在大企业主中反而强于教育程度。与此同时，在 1978—1995 年间创业的企业主中，教育对大多数职业流动经历（除“跳板”型）的效应不大，但对 1996—2005 年和 2006—2014 年间同期群的效应在不断扩大；党员身份对“跳板”型效应随创业时期的推后而加强。

此外，虽然私营企业主职业流动经历呈现出明显的分化，但不同阶层地位的私营企业主社会来源尚未“固化”，而是保持了多元化格局。不论何种类型的企业主，他们在创业前的职业经历都颇为丰富；这种多元来源随着时代的变迁也依然存在。这说明中国的私营经济仍然保持了一定的开放性：各种社会群体可以投身到私营经济中，而不同社会来源的人们都有可能成为大中型企业主。换言之，经济扩张仍然可能为那些抓住了市场机会的后来者们提供舞台。该发现也在其他经验研究中得到了不同角度的印证。^①

本研究揭示了教育和政治面貌这两种微观机制对私营企业主地位获得的影响，虽然这并不构成因果关系。私营企业主群体社会构成变化背后，反映了更为宏观的制度变迁。比如，体制内精英“下海”进入私营企业的比例在降低，这说明对国家公职人员来说，随着体制内福利的制度化，“下海”的诱惑在下降。^②高学历者在毕业后直接进入私营经济的比重自 21 世纪以来上升很快，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是由于 20 世纪末高等教育改革和初级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状况发生重大变化，导致更多私营经济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成为他们就业和创业的主要市场；尤其是近年来的国家政策加大了对创业的激励和支持力度。总之，不同时期的制度环境为各种社会背景的人成为私营企业主提供了不同的机会结构。^③

基于以上对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的分析，我们认为有两点政策意涵：一方面，私营企业主的社会来源多元化的保持与企业家代际传承的张力。影响未来企业构成的主要因素：一是“存量”的延续，这主要表现为既有的企业主队伍能在多大程度上通过代际传承再生产。当前虽然出现了一些家族企业的年轻一代不愿意“接班”及其“海外移民”的现象，但总体而言，本土企业家队伍子承父业是主流，^④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一系列举措为稳定本土企业家的投资和信心起到了积极作用。二是“增量”的开放持续，也就是市场的开放与准入能

① 吕鹏：《新古典社会学中的“阿尔吉之谜”：中国第一代最富有私营企业家的社会起源》，《学海》2013 年第 3 期；李路路、朱斌：《中国经济改革与民营企业竞争格局的演变》，《社会发展研究》2014 年第 1 期。

② 随着宏观形势的最新变化，也有媒体开始报道所谓新一轮“下海潮”的到来，但这一现象目前没有得到全国性数据的支持。

③ 感谢匿名评审人的中肯建议。

④ 吕鹏、范晓光：《中国精英地位代际再生产的双轨路径（1978—2010）》，《社会学研究》2016 年第 5 期。

在多大程度上吸引不同背景的个体投身私营经济，并在市场上逐渐发展壮大。另一方面，私营企业主的社会来源在企业类型上的分化可能带来的政治及社会后果。如果这种分化突破一定的限度，很可能导致企业主群体在诸多行为和态度上的差异将会拉大，尤其集中在利益诉求和表达上。

我们还认为，私营企业主群体的构成变化，会对整个社会结构产生直接和间接的影响。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测算，个私经济从业人员占就业人员的比例，从1990年的3.5%增长到2015年的40.85%，已超过全部就业人口的1/3，占城镇就业人口的78.29%。显然，雇主（私营企业主）的结构变化，以及伴生的产业结构、企业治理结构和文化的变化，最终会成为形塑中等收入群体、工人群体的新动力。

本文的分析从全国层面，为未来私营企业主群体的结构变化勾勒了一幅积极的图景。当前，我国的经济结构正在经历一场艰苦的调整，但恰恰是这一调整的过程，给企业家队伍带来了新动力：市场为越来越多的人打开了大门，尤其是拥有人力资本的青年群体更有可能成为新一轮经济转型升级的“弄潮儿”，他们越来越多地不再需要“体制”这个跳板，而是直接进入市场。我们认为，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从来没有哪一个历史时期像今天这样，为来源如此多元的各类群体提供强劲的市场投资机遇，可以说，我们迎来了一个体制和市场蕴藏的活力全面激活的转折新时代。

还需一提的是，囿于调查资料，我们未能对中国私营企业主社会形成的因果机制制作更为缜密的探究；在研究议题上，未能对“谁成为企业家”作进一步的回答。另外，中国的私营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本文对全国的总体性分析并不能简单地推论至省市层面。以上不足将是下一阶段研究的主题。

〔责任编辑：刘亚秋 责任编辑：冯小双〕